

何干之遗著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

HONGGUO MINZHU GEMING SHIQI DE ZICHAN JIEJI

D663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

何干之 遗 著

刘 炼 整理修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琪生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

何干之 遗 著

刘 炼 整理修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7,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3074·560 定价(六) 1.05 元

序

李 新

五十年代末，干之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的教学任务不太繁重，因此我极力动员他写书。反复商量的结果，他决定写《中日关系史》，从古写到今，计划分三卷写完，全书约一百万字，准备四年完成。随后，干之同志便开始查阅文献书刊，草拟提纲。不到半年，全书三卷的提纲都拟就了。干之同志精通中日两国古今文字，以他的才学，如果按计划写下去，这部书一定会写成功，写得很出色。

就在这个时候，近代史研究所接到一项任务，要写一本《蒋介石传》。据说是陈毅同志的倡议。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蒋介石联共、反共的历史，向反殖民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政治代表人物）说明：要想取得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必须联合共产党、联合工农。请看：当蒋介石联共的时候，中国革命就蓬勃发展，他也受到人民的拥护；当蒋介石反共的时候，革命固然受到挫折，但终究还是要前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蒋介石自己却因背叛人民而受到人民的唾骂和抛弃。这样深刻的历史教训，不是很能引人注意的吗？近代史研究所在讨论如何写《蒋介石传》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项任务很重要，但却找不到写这本书的适当人选。最后决定由我去请干之同志。

干之同志慨然承诺了写《蒋介石传》的任务，把《中日关系史》一书的写作推迟。接着，近代史研究所为干之同志配备了几个助手，并且还专门腾出了工作室，让干之同志住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写作。

干之同志很快就拟出了写书的计划。听说在讨论计划的时候，有人认为替蒋介石立传不妥，于是决定把书名改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这一改实际上把书的性质和内容都改变了。因为写《蒋介石传》总得遵守传记的体裁，以蒋介石的事迹为主，评论不会过多；而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书名，势必写成为论著，以论述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态度为中心，史实纵使很丰富，也不能把蒋介石的一生包括无遗。干之同志虽然对这样改变计划感到为难，但既然做出了决定，只好勉力为之。

进入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运动比五十年代后期还更频繁、更紧张。但干之同志仍然坚持他的写作。每写好一个问题，就拿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去讲授，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到一九六三年“四清”运动开始时，他已把这本书的大部分写成了。但这时的国际形势与五十年代后期已大不相同，因而这本书也就无人过问了。一九六四年，我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们都到甘肃去参加“四清”运动。一九六五年回京后，我在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提起干之同志写这本书的事，大家都主张这本书应该写完出版。我把这个意见告诉干之同志时，他非常兴奋，随即进行整理加工，准备付印。谁知他只把上半本整理出来，初稿刚印成几份铅印的清样，正要继续整理下半本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干之同志的著作和其他同志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一样，被诬为毒草，遭到批判。这本由《蒋介石传》演

变而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然更难幸免。不料这本书的大部分稿件（上半本的全部铅印稿和下半本的手稿），居然侥幸地保存了下来，真可算得幸事了。当时被指骂为“替反动派树碑立传”、“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作品，现在能再见天日，让大家来重新品评，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干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折磨，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北京郊区因心脏病猝发而溘然长逝了！我那时还是“黑帮”，还没有“解放”，没有资格去参加告别和吊唁仪式。干之同志是我敬爱的老师，是我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在他逝世时竟不能一睹遗容，略表哀思，至今仍感到无限的遗憾！

我一直认为干之同志的有些著作和文章，是可以传世的，应该有人给他整理出版。现在他的夫人刘炼同志和他的助手之一陈宁生同志把这本书整理修订出来了。干之同志如在泉下有知，一定十分高兴。广大的读者能读到从劫灰中保存下来的干之同志这本遗著，一定非常满意。至于我和一切干之同志生前的友好，对刘炼同志和陈宁生同志的辛勤劳动，惟有表示衷心的感谢。

每个人的著作，都要受到时代的局限。干之同志当然也不例外。整理者为了存真，尽量保持作品的本来面目，这种精神是可取的。不过，今天的读者则需要结合着当时的条件来读这本书，而不可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虽然如此，干之同志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不少材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和可贵的。而且在今后若干年内，仍将不失其应有的价值。我之所以写这篇序来推荐这本书，并说明它的原委，其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假如干之同志当初不写这本书，而去完成他的《中日关系史》，其价值可能更高。但这只是假如，今天已毫无意义了。而眼前这本书还是值得推荐的。究竟这本书的价值如何，请读

者同志们读后去评论吧!

这本书是干之同志的最后一本著作。干之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从事著述，他的作品是很多的。希望刘炼同志和中国人民大学有关的同志们再努一把力，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搜集起来，精选出一部文集出版，这对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将是一项有益的贡献。

我们会永远怀念干之同志的，我们希望及早读到他的文集!

一九八〇年四月于北京

写在本书出版时

刘 炼

凌晨三点钟，最后整理修订完了干之同志的遗著《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我深吁了一口气，手捧着这厚厚一叠誊清的文稿，面对着干之同志的遗像，心潮激荡，不禁回忆起他十年前临终之际满怀遗憾的嘱托。

那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我们当时在北京郊区劳动，不满十六岁的孩子要远去云南河口兵团，我们请了三天假回家收拾孩子的行装。这两天干之一直胸闷，可他却执意要翻那旧铁皮箱里存放着的文稿，并叫我看。那是他早年七、八本书的写作提纲，都是我抄写的。其中一份是《中日关系史》，纲目最详细，有二十多页稿纸。他说：“这份提纲花了不少心血，看了许多日文资料才写成的。后来改写《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就放下了。本打算接着动手写《中日关系史》的，很遗憾，怕不能完成了。”他又捧起《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手稿，说：“这本书是外交部陈毅同志建议写的，毛主席、周总理一直强调要研究敌我友三方面，我真想把它完成。”我说：“这么批判，你还敢搞吗？”他说：“不怕，只要可能，我就动手修改，我希望还能入党工作十年。”当时，我真钦佩他的坚定和勇气。他又叹了口气说：“只怕来不及了，万一我突然倒下，希望妳能继续完成它！”我哭了，不让他再说下去。这天，他心绞痛竟连续发作十多次。三

天假期满了，我劝他留在家里养病。他说：“不行，他们再三嘱我按时归队。”十一月十五日早上，北风呼啸，人只能低头侧身行走，他口中咬着一块手帕，顶着狂风前进。第二天，他找过好几位同志谈心，谈将来的工作，最后他到我的宿舍来找我，大概要讲些什么吧，谁知他刚走到胡同口，突发心肌梗塞，倒在地上睁着双眼，满怀遗憾地逝世了。他壮心未已，不甘离去啊！那天的谈话，竟成永诀，我是多么后悔当时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匆匆开了个小型追悼会，同志们要我讲几句话。我如拳梗喉，神思恍惚，但还是挺直了腰，望着他蜡黄的面孔，抑制住内心的悲痛说：“我一定要完成他未竟的遗志。”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整理好他的遗著遗稿；一定要象他那样勇敢、坚定地搞好党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干之同志被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审查。从此，干之一生从事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都被全盘否定了；这部书稿当然也受到批判，被否定了。干之去世了，凶残的“四人帮”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审查在继续进行，迫害更变本加厉。干之同志的追悼会后，他们派人来中国人民大学，气势汹汹地质问：“谁决定开追悼会，谁决定骨灰送革命公墓的？！”他们并调走了干之的档案，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在那种条件下，我虽有整理这部书稿的决心，但哪里有可能着手整理它呢？！就是整理好了，又有哪家出版社能给出版呢？！

直到“四人帮”垮台，特别是党恢复了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了被桎梏的真理，干之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一九七九年一月，党组织正式为干之平反昭雪，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干之同志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从事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培养党的

理论、教育干部方面，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很大贡献。”说他是我们党“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彻底推翻了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理论路线上的是非弄清楚了，才有了整理这本遗著的条件。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我开始这部著作的整理修订工作。

干之写作这部著作，开始于一九六一年。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同志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为干之配备了五位助手，他们是贾维诚同志、丁原英同志（已病故）、夏良才同志和陈宁生同志，此外还有当时从杭州大学来所进修的杨树标同志。他们不辞辛苦，搜集资料，调查访问，编写资料长编，付出许多劳动。干之手稿的大部分是中国人民大学桑咸之和刘崇敬两位同志帮助抄写的。在这里，谨向这些同志致谢。

在这次整理修订过程中，得到了我校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齐齐哈尔师范学院领导热情赞助，借调该院政治系陈宁生同志来京参加整理工作一年多。没有陈宁生同志的协助，此书的整理工作不可能这样快完成。我衷心地向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和陈宁生同志以及关心这部著作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整理修订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干之当年写这部著作时，助手们所搜集编写的资料长编和访问革命老人的记录，叠起来有两三尺高，如今，片纸无存了；他自己写的札记卡片，也全部散失了。我和陈宁生同志一切从头做起，按照遗稿的系统和线索，依次序去搜集资料，阅读他过去看过的书籍，逐句逐条查对引文，有时为找一条引文出处，要花三、四天时间。为了科学、准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搞清他的分析和论述，增订或改写一节文字，往往要看许多有关资料，反复核实修改，才最后定稿。

在这次整理修订工作中，我虽然尽量保持干之原著的体系和观点，但因为时隔十数年，所以根据一些新资料，我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订和增补，特别是未经干之最后定稿的后三章，则增补较多。不当之处，自然由我负责了。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干之同志这部遗著，从开始写作到现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沧桑。值得庆幸的是，在他逝世十年之后，终于出版和读者见面，又能服务于人民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资产阶级	
	政治运动	1
一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变化	1
二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6
三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	11
四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	22
五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及其失败	27
六	中国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幻想	34
七	中国革命新时代的开始	42
第二章	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破裂	46
一	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	46
	反对北洋军阀的历史教训	46
	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教训	52
	列宁、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	55
	国民党改组	57
二	国民党右派的反动	60
	冯自由反对国民党改组	60
	邓泽如反对革命政纲	62
	戴季陶反对“党内合作”	64
	廖仲恺被刺事件	65
	西山会议派	67
三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	70

第一号政治冒险家	70
真假两种姿态	73
爬上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76
初试向共产党人开刀	79
四 帝国主义从革命内部寻找同盟者	83
帝国主义分裂政策	83
把蒋介石集团拉去	86
把汪精卫集团拉去	90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95
第三章 在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面前，资产阶级各派的	
矛盾和分裂	100
一 国民党政权中各反革命派的对立和变化	100
蒋介石下台又上台	100
东北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	104
国民党新军阀战争和蒋介石反革命专政的加强	107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联盟	116
二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派	120
国民党民主派	121
民族资产阶级反蒋派	125
国民党改组派	127
三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政策和民族资产阶级	
抗日倾向	131
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主义	131
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国内政策	137
上海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	140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42
福建事变	143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146

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和组织	150
	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共抗日	151
	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的动摇	154
	逼蒋抗日	158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62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66
第四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	169
一	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方针	169
	冀察当局战和不定	169
	上海、南京保卫战的教训	175
	阎锡山的“应战”和“观战”	180
	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83
二	国民党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	187
	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	188
	以共产党为主要敌人	194
	蒋介石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矛盾	198
	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202
三	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207
	抗战初期中间党派一致拥蒋	207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主同盟	213
	所谓中间立场是什么	217
	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220
四	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	223
	史迪威来华	224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和国共谈判	230
第五章	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打碎国民党反动国 家机器	236
一	蒋介石的战争政策与和平欺骗政策	236

	战后国内战争的威胁	236
	蒋介石为什么要和平谈判	240
	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	246
	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的实质	253
二	民族资产阶级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257
	民主党派对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	258
	民主党派的政治分野	264
	民主同盟的解散	269
三	国民党的假和谈和革命阵营反对派	275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	275
	国民党求和的目的是什么	281
	民主个人主义者向何处去	289
四	将革命进行到底	292
	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292
	各民主党派反蒋反美	295
	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政权	299
	地方性局部性的和平解放	301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主要经验	307

第一章 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变化

一八四〇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起点，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主权被蹂

瞞,中国封建经济遭受外国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和控制,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它决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中国开始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本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着西方工业品的侵入,清朝闭关政策(限制对外通商)也有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可是资本主义列强逼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关税协定权、领事裁判权,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大量的主权。

通商口岸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这些基地,最初在沿海沿江各地,后来扩张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外国侵略者把大量鸦片和商品先运到通商口岸,然后向内地推销,同时用极低价格收买各地农产品、矿产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聚集到商埠转运出国。

外国进口货物中最大宗的是鸦片,贩卖鸦片严重破坏中国的法纪,并毒害了中国人的健康,受害人数不下二百万人。到八十年代,棉布、棉纱大量进口,煤油、钢铁、五金、机械、电器材料、颜料、药品、呢绒等进口也迅速增加。中国出口品主要是农矿产品、蛋类、皮毛、猪鬃、山货、桐油、矿石、矿砂,等等。

中国农产品和外国工业品的交换是不等价的。外国商人拥有各种特权,外国商品只纳百分之五的关税就可以在全国通行无阻。外国商人还有逃税的各种办法,例如颜料要是提高提炼浓度五倍,就只纳五分之一的关税,外商走私更是常有的事。他们对于中国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收购农产品或是通过买办给